

毛泽东的战友易礼容

向敬之



易礼容

1921年8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从上海返湘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就是易礼容，他们和何叔衡一起创立湖南第一个党小组，即“三人小组”，并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成立中共湖南支部，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党支部之一。

创办长沙文化书社

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是从美国回来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汤松，上任伊始，他便将原湖南甲种商业学校改为商专，恢复高等教育，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延聘了杨昌济、刘秉麟等名师及一批外籍教师教学，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锻炼他们的财会、管理能力。

1916年秋，易礼容从湘乡驻省中学堂转入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学习，任学生自治会会长。

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由上海到武汉，邀请易礼容回长沙共同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湖宗街56号正式营业。此处商业繁华，是出湖宗门达湘江河运码头必经之道，算得上是一条文化教育街，除了湘雅医学校外，湖南笔业公司也毗邻而建。

长沙文化书社内部事务由易礼容主理。书社初办时，经费严重短缺，仅有借来的20元作日常开支。大家只有微薄的生活费，但没有薪资。易礼容等就着一个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子做饭。

大家毫无怨言。他们以传播新文化思想为营业范畴，对外经营各种思想人文书籍，开业之初推出书籍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积极宣传骨干为新民学会会员，团结了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政界、商界的社会贤达50余人。

易礼容以出色的管理才能与热忱的服务态度，全力配合特别交涉员毛泽东开展工作，和同志们把文化书社经营得风生水起，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的高度关注。他们不但在平江、衡阳等多个县市建起了分社，还与全国各地杂志社、出版机构，如上海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等11处出版机构建立了联系。

文化书社不再是湖宗街上的小书店，而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这里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星火之地。

“了不起的绝妙之事！”

五四运动爆发时，主政湖南的张敬尧，对湘民实行高压政策，扣留来自北京的所有电报新闻，“丝毫不许登载”（《湖南政报》第1卷第3期

《湘省政闻》，1919年9月）。

人们还是通过报纸想办法摘要转发的消息里，了解到巴黎和会青岛交涉失败的内情。新民学会成员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发动省会20所中等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国耻日示威游行，“誓必争回青岛”，却被军警驱散。

新民学会酝酿湖南学联组织。1919年5月28日，长沙各大学校学生20余人，齐聚省教育会坪，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学生会会长易礼容担任评议部长。

易礼容等发动长沙师生抵制日货，以学联名义邀请泥木、轮船、印刷、出版等30多个行业和基督教青年会、长沙县农会及各校代表60余人至湖南商专召开茶话会，商讨把学联、救国十人团和国货维持会等合并成立各界联合会。

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商专校长汤松的支持和积极推动。汤松遭到张敬尧免职通缉，被迫离开长沙赴湖北。易礼容随汤松转学汉口私立明德大学，迅速在该校建起了旅湘湖南学联的驱张据点，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进京向北洋政府抗议张敬尧督湘的种种暴行。

张敬尧祸湘，大开烟禁，使鸦片流毒甚广，导致士绅平民吸食者众。他召集各县团总发放烟种，大面积种植，仅“长沙一县，发子至四万包之多”。湘民惊恐，奇怪烟禁之际，为何还出现了大量种子，“欲寻获装运，久不能得”。

1919年12月24日，易礼容根据武昌鲇鱼套火车站职员游泳提供的信息，带领数名同学，在车站截获了张敬尧通过张宗昌从奉天（今沈阳）私运至湖南醴陵（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的45麻袋鸦片种子，每袋重约200斤，阻止其运走，并拍下照片，机智地躲过严密的追查，为驱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被毛泽东誉为“了不起的绝妙之事！”



全国第一张红色股票

推出全国第一张红色股票

有了文化书社的成功试验，富有管理经验的易礼容，受中共湘东区委员会指派，于1922年11月前往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于第二年2月17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营兑换、粮食、服务、器用、南货、杂务等，并由专人负责兑换银钱，办理工人储蓄、贩卖工人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各类书报。易礼容担任总经理，毛泽民为兑换股经理，他们创造性地推出了全国第一张红色股票。

据安源工运史记载，1922年9月，经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决定，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以筹措合作社所需

资金。《合作社招股简章》规定：每股洋5角，共招2万股；凡工人俱乐部每月工资在9元以下者，劝认1股；9元以上者，劝认2股；多认者听便。结果，每人至少认1股，最多的认14股。到1923年初，工人共认购1.56万余股，股金7845元。

邓中夏1930年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述“二七”惨案后“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时，把工人消费合作社看作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成绩之一。易礼容等在这里，发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的股票。同时发行的铜圆票和纸币，成为中国红色革命运动中最早发行的货币。

少年投身商学报国的易礼容，最早尝试了党领导的金融事业，为我党的经济工作创造了最初的经验，对以后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他是中国早期红色革命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重要的复合型商学和金融专家。

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马日事变”后，易礼容面临危局，出任中共湖南省临时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后于1928年赴任江苏农民部长途中，因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在国民党通缉的157名共产党人名单中，列在第13名），险情频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一度流亡日本，“九一八”前夕回国，结识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参加工人运动工作，担任中国劳动协会有工人勇进队参谋长。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国爱党的赤子之心。

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天写了7封信，除了分别致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6名国民党高官外，还专门给在上海的老友易礼容去信一封。

他在信中直呼“韵珊兄”，此为易礼容乳名，只有特别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可见，他对易礼容的思念之情甚为殷切，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此次表示对易礼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更是期待这位曾与自己一起创办文化书社、推动驱张运动的老战友，能够再次相约千里并肩作战：“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所在一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期待与他“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落款为“杨子任”，此为他的曾用名，易礼容对这个名字是熟悉的。这既让易礼容一看就明白，也是对尚在国统区的他的保护。

国共和谈失败后，易礼容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他离开重庆，辗转川黔桂粤，历经艰辛，抵达香港，将中国劳协总部迁至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返回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积极投身新工会和人民政协工作，担任过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为巩固和扩大中华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者系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的。对于徐冰的这番托词，沈醉感到很意外，也很恼怒。他把脸一沉，说，请考虑一下，要是不接受邀请，我是没法回去复命的。徐冰一听，立即转过脸不再理会会全身武装的沈醉，而是一个劲埋怨吴景中。结果，从第二天起，跟踪徐冰的特务就增多了。为了不起惹麻烦，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单独外出。

听徐冰补叙完后来的情况后，沈醉一个劲地表示歉意。徐冰却一再安慰沈醉，说提提这些往事，是希望沈在写军统罪行材料时，把这种“霸王请客”的事也不妨写写，好让人们知道军统和戴笠的这一套手法，并不是要追究沈醉个人的罪责。他还特意对沈醉说，过去你由于职业关系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应该学会讲真话。听了徐冰这样直率、真诚的话，沈醉心里分外感动，但仍没有消除徐冰会找机会“回敬”他的担心。

1964年12月底，在北京的十几位特赦人员带着家眷去东南几省参观回来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请他们在政协礼堂吃饭，徐冰也参加了。他特别热情地招呼沈醉，并拉着沈和他同坐在一处长沙发上，还问了沈最近写材料的情况。徐冰这样对待沈醉，促使沈醉最终彻底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他切实体会到了徐冰这样的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与品格，以至20多年后仍然念念不忘，并将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题为“冤家路宽”。

沈醉感到徐冰的大度特别感激，对其为人分外崇敬。沈醉是原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机关的重要干将。特赦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新生感到高兴，同时也因过去作恶太多而担心一些掌了权的共产党人报复他，给他穿小鞋或使他难堪。对徐冰，他怀有同样的忧虑。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聚餐会上，沈醉对会议主持人徐冰感到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吃完饭，大家开始聊天。这时，徐冰笑容可掬地走到沈醉身边坐了下来，问他是否认得自己，并递给沈醉一支烟。沈醉吃了一惊，心想这人肯定也是过去受过自己迫害的人，冤家路窄，等着挨训或穿小鞋吧。他接过烟后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仿佛见过首长，一时想不起来。徐冰一把将沈醉按在他身边的沙发上，笑呵呵地说：你过去接触的人太多，当然想不起来，你还记得你和吴景中来请我去吃饭的事吗？我叫徐冰，你该想得起了吧？徐冰的话一说出口，沈醉立刻想起了十几年前

叶介甫

“冤家路宽”：徐冰与沈醉

徐冰，1903年1月出生在河北省南官县一个富农兼商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翻译，从事过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徐冰在重庆与文化科技界和上层民主人士交往密切，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参与领导了对济南、北平的接管工作，曾任两市第一批副市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卓著。他为人热情直率、平易近人，深得党外朋友的信赖与好评。

1959年8月，毛泽东提出在国庆十周年时可否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问题，在与特赦战犯们的交往与接触中，徐冰的人格魅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比如，杜聿明感到徐冰“位虽高，态度却很谦虚、诚恳，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宋希濂对徐冰的风趣、幽默留有深刻的印象。沈醉是第二批特赦人员中的一位，也是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一名国民党特

务机关的头目。沈醉对徐冰的大度特别感激，对其为人分外崇敬。

沈醉是原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机关的重要干将。特赦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新生感到高兴，同时也因过去作恶太多而担心一些掌了权的共产党人报复他，给他穿小鞋或使他难堪。对徐冰，他怀有同样的忧虑。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聚餐会上，沈醉对会议主持人徐冰感到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吃完饭，大家开始聊天。这时，徐冰笑容可掬地走到沈醉身边坐了下来，问他是否认得自己，并递给沈醉一支烟。沈醉吃了一惊，心想这人肯定也是过去受过自己迫害的人，冤家路窄，等着挨训或穿小鞋吧。他接过烟后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回答：仿佛见过首长，一时想不起来。徐冰一把将沈醉按在他身边的沙发上，笑呵呵地说：你过去接触的人太多，当然想不起来，你还记得你和吴景中来请我去吃饭的事吗？我叫徐冰，你该想得起了吧？徐冰的话一说出口，沈醉立刻想起了十几年前

的一件往事：

在重庆时，有一天，沈醉的一位老同事吴景中匆匆来找我，说有事要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想请沈醉给安排。吴景中本是中共党员，后来成了叛徒，当时在中美情报合作所当科长。几天前，他在路上遇见了徐冰。他与徐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过去关系很好，他知道徐冰是延安派来重庆工作的，请示戴笠可不可以和徐冰来往。当戴笠听完吴景中的情况后，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徐冰吃晚饭。他要沈醉作好准备，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作陪，还叫沈醉派车要吴景中去接徐冰来。

第二天，沈醉决定自己驾车陪吴景中去，一则表示戴笠对客人的重视，同时还带点威胁的味道。沈、吴两位到了徐冰住处后，吴景中说明了来意并把沈醉介绍给了徐冰，可徐冰一口谢绝了。他首先请沈醉转达对戴笠的谢意，说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将来如果认为有必要，他会去拜会

萧楚女改名取意于屈原

韩惜园



WENRENYISHI

革命先烈萧楚女，原名为萧树烈，“楚女”是他自己改的名字，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学名为“楚汝”。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反复吟诵屈原的《离骚》，深受感染，决定给自己改名，以致敬屈原，彰显志向。

由于他和屈原一样出生于楚地，便取了一个“楚”字。然后，又从屈原写的“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诗句中，取了一个以《楚辞》中的神女象征爱国志士的“女”字。这样组成的“楚女”二字就有了革命意志坚定、能够力

挽狂澜的神女的意思，再加上本姓，就成了“萧楚女”。萧楚女用这个名字激励自己，将来要为挽救民族危亡去干一番大事业。

当萧楚女以新名字不断发表文章且影响力越来越大时，一件尴尬而有趣的事发生了。一些青年学生、军官和职员，看作者名字误以为这是一位思想深刻、文采斐然、“楚楚动人”的“才女”，纷纷写信来表达爱慕之情。为此，萧楚女只好专门在《新蜀报》登了一则启事：“楚女是个年近四十的男子，脸麻、背驼、多须、近视，并不是未婚的女性……”这才使“笑剧”结束。



WENRENYISHI

李四光宁镇山脉地质调查

王荣 王抒滢

1928年，李四光在镇江一带开展基础地质调查，发现宁镇山脉是一条大致为东西走向的弧形构造，弧形的顶端在镇江向北突出。李四光推断，在宁镇山脉的南方有南北走向的山脉存在。经过调查，李四光果然在宁镇山脉南方相当辽阔的平原中找到了南北走向的茅山山脉。虽然两组山脉方向不同，但在成因上关系密切。

1929年，李四光多次带领工作小组到宁镇山脉开展地质调查，系统采集标本、化石进行精心研究鉴定，对宁镇山脉地层进行系统划分，为宁镇山脉地层作为我国地质工作标准地层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9年，李四光发表论文《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形式及其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概括了宁镇山脉等地不同类型的构造特点，明确了构造体系的概念，推断了每一类构造体系在有关地区的构造运动方式和方向，对山字型构造体系进行初步理论分析。

1930年，李四光带领学生李毓尧、朱森、李捷等人在开展长江中下游基础地质调查时，对镇江船山一带的石灰岩进行详细的研究，根据其岩性及其所含蜓科化石，建立了船山地质剖面，划定了地层层序，将船山一带的石灰岩定名为黄龙石灰岩。对地质学家丁文江命名的“船山灰岩”重新厘定为黄龙灰岩之上地层，时代属早二叠世。

1932年，李四光、朱森等人通



WENRENYISHI

梁思礼在津赈灾

王勇刚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39年冬编印的《天津意租界水灾难民救济委员会征信录》中，载有其在天津参与赈济水灾的史实。当时梁思礼年仅15岁。

梁启超1929年在津逝世后，位于天津意租界玛尔谷路（今河北区民族路）的旧宅“梁公馆”仍为梁夫人王桂芬及其孩子们的家。天津沦陷前后，梁家子女或已成家立业或正投身抗战。年少的梁思礼和姐姐在天津继续学业，与母亲相依为命。1939年夏，天津暴发特大洪水，灾民啼饥号寒。“梁公馆”地势较高，少受波及。梁家积极行动，不仅募集善款，而且捐赠单衣、夹衣、棉衣计15件之多。正在耀华中学校就读的梁思礼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

间参加义赈。

天津意租界水灾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时，担任常务委员、委员的多为天津名流，社会影响力大，赈灾效果明显。该委员会下设管理、服务、卫生、文书、会计、庶务等股及收容所8处，梁思礼为管理股19名职员之一。由于尽心尽力尽责、工作表现出色，不仅在“致赠慰劳状名单”中开列“梁思礼先生”之名，而且特别刊登其头像照片。梁思礼虽然稚气未脱，但目光炯炯、表情从容。

梁思礼后于1941年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毅然回国，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作出重要贡献，是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 and 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WENRENYISHI

黄永玉的“正业”

王剑

很多人都知道黄永玉个性十足的水墨画，以及他创造的猴神神话。殊不知，木刻版画才是他的“正业”。

1953年，黄永玉受邀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被委派到荣宝斋学艺期间，黄永玉在李可染的引导下，拜访了齐白石，为他创作了一幅肖像木刻版画。齐白石见画后很开心，连声夸奖：“蛮像咧！”并现场作了题跋：“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人加题，年九十四矣！”然后加盖朱文的“木人”白文的“齐白石”和大印“悔鸟堂”。齐白石的认可，让黄永玉信心大增。不久，黄永玉迎来重要人生机遇：受外交局的邀请，为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木刻插画。

1955年，黄永玉只身来到云南路南县额冲农村体验生活。采风期间，他认识了娴雅美丽的撒尼姑娘“普兹菲”，并邀请她做阿诗玛的原型人物模特儿。回到北京后，黄永

玉精心创作出套色木刻版画《阿诗玛》。这套版画作品分为10幅，包括《阿诗玛像》《吹口弦》《织布》《射箭》《公房》《打虎》《阿诗玛在牢中》《她被水冲走了》等。作品充分诠释了撒尼人温润爽朗、崇尚自由、勤劳勇敢、坚贞不屈的民族品格，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时代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美术作品对文学作品的完美表达和再次升华，是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随后，黄永玉又创作了《春潮》《雷锋同志像》等木刻版画作品。尤其是雷锋同志像，可谓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画作者就是黄永玉。黄永玉说：“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不敢苟且、不敢懒惰，这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黄永玉秉持刻刀的虔诚和认真，才是他成功的关键。